

A Collection of
Wang Zhongshu's Works

王仲殊文集

王仲殊 著



III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三十八号

王仲殊文集

第3卷

——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A Collection of
Wang Zhongshu's Works

Vol. III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Wang Zhongshu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王仲殊先生 70 余篇学术论文以及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文集分 4 卷, 各卷题目依次为“考古学通论及中国考古学的若干课题”、“中日两国古代铜镜及都城形制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和“中国古代遗址、墓葬的调查发掘”。王仲殊先生始终强调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 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他的治学方针和研究成果在本文集中得到充分的显示与有力的见证。

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博物馆部门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日本古铜镜——通商使物述	61
袁世清与小野妹子	63
——日本皇族太子幼时对中国政策	70
关于日本第 7 次遣唐使的船东	73
升真成与阿倍仲麻吕、高僧鉴真	83
对本署近发现的太安万担墓	94
关于《周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的标点和解	103
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的交往	116
论日本出土的吴镜	123
再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铁三角镜铭文	152
论日本巨大古坟箸墓所葬何人的问题	163
——是孝德太子或是白鸟	163
论所谓“倭国土国”之存在与否	172
从中日两国文献资料看古代倭的疆域及其他有关问题	188

目 录

古代的中日关系

——从志贺岛的金印到高松塚的海兽葡萄镜	1
日本高松塚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	
——为高松塚古坟发掘十周年而作	16
再论日本高松塚古坟的年代及所葬何人的问题	22
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	34
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	48
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概述	61
裴世清与小野妹子	
——日本圣德太子的对中国政策	70
关于日本第7次遣唐使的始末	75
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	85
日本最近发现的太安万侶墓	94
关于《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的标点和解释	103
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的交往	116
论日本出土的吴镜	123
再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	152
论日本巨大古坟箸墓所葬何人的问题	
——是卑弥呼抑或是台与	163
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172
从中日两国文献资料看古代倭的国名及其他有关问题	188

从古代中日两国的交流看宗像·冲之岛的祭祀遗址·····	209
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的“东国”	
——论埼玉稻荷山古坟铁剑的铭文·····	220
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	233
新罗的历史·文化及都城的形制·····	257
论开元通宝对古代日本货币制度的影响	
——兼论开元通宝传入琉球列岛的经路·····	270
论琉球国“万国津梁之钟”的制作地问题·····	289
灿烂的出云古代文化·····	309
从东亚石棚（支石墓）的年代	
说到日本弥生时代开始于何时的问题·····	317
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与世界考古学接轨	
——访当代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	326
见微知著 博通中西	
——王仲殊先生访谈记·····	334
附录	
墨西哥古代文化简述·····	344
阿尔巴尼亚考古旅行记·····	355

CONTENTS

Ancient Sino-Japan Relationship: Focusing on the Gold Seal from Shikano-Shima Island and Bronze Mirror from Takamatsuzuka Tumulus	1
Notes on the Date and Owner of the Takamatsuzuka Tumulus, Japan	16
Re-discussion on the Date and Owner of the Takamatsuzuka Tumulus	22
Decipherment on the Xinmao-year Paragraph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Haotaiwang Stele	34
Re-discussion on the Xinmao-year Paragraph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Haotaiwang Stele	48
Summary of the Japanese Envoys to Sui and Tang Empires	61
Ono no Imoko and Pei Shiqing: Crown Prince Shytoku's Diplomatic Policy towards Sui and Tang Empires	70
The Historical Details of the Seventh Japanese Envoy to Tang Empire	75
Jing Zhencheng, Abe no Nakamaro and Kibi no Makibi	85
The Newly Discovered O no Yasumaro's Tomb in Japan	94
Textual Study on <i>Wo Biography of Wei Zhi</i> (《魏志·倭人传》) and <i>Hou Han Shu</i> (《后汉书·倭传》)	103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i>Wo</i> and <i>Jiangnan</i> Area in the 3 rd Century: Focusing on the Unearthed Mirrors in Japan	116
Remarks on the Wu Mirrors Unearthed in Japan	123
Re-discussion on Bronze Mirror with Coiled Dragon Design and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 of "Fourth Year of Jinchu Era"	152

Himiko or Toyo: Discussion on the Owner of the Grand Hashihaka	163
Tumulus in Japan	163
Did there Exist So-called “Womiantuguo State” in Ancient Japan?	172
Literal Evidences on the Country Name of <i>Wo</i>	188
Ritual Sites on Okinoshima Island within the Munakata Area: from the Viewpoint of Ancient Sino-Japanese Communication	209
“Azuma no Kuni (Eastern Stat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220
Resources	220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astern States beyond the Sea in the Period of Eastern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233
Silla’s History, Culture and Layout of Capital	257
Kaiyuantongbao’s Impact on the Designing of Ancient Japanese Coins	270
“Bell of the International Bridge” in Liuqiu Kingdom: Problem of its Produce Area	289
The Splendid Ancient Izumo Culture	309
The Beginning of Yayoi Period in Japan: Focusing on the Date of Dolmens in Eastern Asia	317
Conforming Chinese Archaeology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rchaeology: Interview of Prof. Wang Zhongshu	326
Seeking the True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An Interview with Prof. Wang Zhongshu	334

Appendix

Brief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Mexico Culture	344
Archaeological Tour in Albania	355

古代的中日关系

——从志贺岛的金印到高松塚的海兽葡萄镜

作为太平洋西部的岛国，古代日本走向国际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大陆的中国。从公元1世纪开始，日本长期谋求与中国交往。随着东亚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在到7世纪为止的700年间，日本对中国关系的开展可以分为“初发期”、“确立期”、“急进期”和“成熟期”等四个时期。

1世纪是日本对中关系的“初发期”。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当时日本列岛上百余国并存，其中与中国汉朝设在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有联系的约三十国。奴国是三十国中的一国，其位置在今九州北部的福冈县境内。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和《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奴国王遣使到东汉的首都雒阳朝贡，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在福冈市志贺岛发现“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图1）。长期以来，主要是因为金印的钮作蛇形，印文为刻凿而非铸出，与中国古代的印章制度不合，学术界有认为它是贋品的。1956年在中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发现了滇王的金印，对照《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可以确认是西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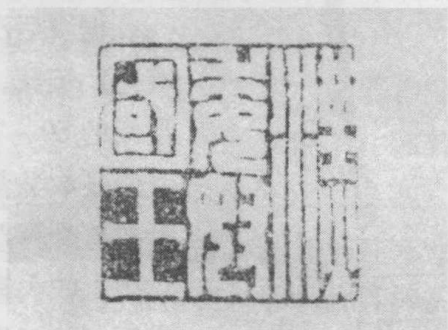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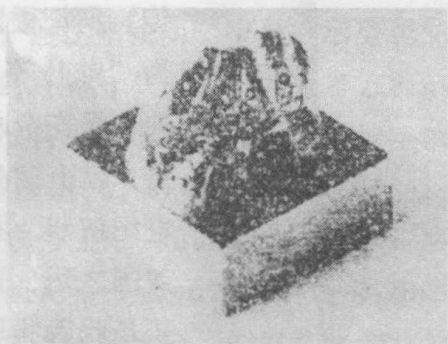


图1 “汉委奴国王”金印

年) 赐给滇王的。1959 年我在《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文中指出, 由于滇王的金印也具有蛇形的钮, 其印文亦为刻凿而非铸出, 可以证明“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是东汉光武帝所赐的原物无疑^[1]。这枚贵重的金印在志贺岛出土, 说明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是何等的正确!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 奴国的人口有 2 万余户之多, 与同在九州北部的末卢国 (4 千余户)、伊都国 (1 千余户)、不弥国 (1 千余户) 相比, 显然是大国。在考古调查发掘中发现的许多弥生时

代的遗迹和遗物说明, 以稻作农耕和青铜器铸造为代表的奴国的社会生产力是相当发达的。从《魏志·东夷传》的记载看来, 3 世纪时邪马台国对九州北部诸国有一定的支配权。但是, 早在 1 世纪中期, 邪马台国的势力尚未发展, 奴国应有充分的自主权。由于奴国面临对马海峡, 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便利, 所以能率先派遣使者经由半岛西海岸的乐浪郡, 前往雒阳。总之, 古代日本走向国际化的最初的一大步是从今福岡市的博多湾迈出的。

学者们都认为《后汉书》《安帝纪》和《东夷传》所记倭国王之名为“帅升”, 但我主张其名为“帅升等”^[2]。帅升等应该是邪马台国的男王。他于汉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 107 年) 遣使到雒阳朝贡, 献上“生口” (奴隶) 160 人。这说明, 到了 2 世纪初期, 邪马台国的国力已有所增长, 所以能继奴国之后, 遣使与中国建立关系。以奴隶为贡品, 正是此后邪马台国的一贯做法。

据《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 男王统治邪马台国约 70、80 年, 到了 2 世纪的 60~70 年代, 即东汉的桓、灵之间, 倭国大乱。日本学者从弥生时代的高地性集落、武器及牺牲者的遗骨等方面论证战乱的情形。奈良县东大寺山古坟出土的大铁刀在铭文中有关汉灵帝的“中平”年号, 表明它的制作在 2 世纪的 80 年代, 与倭国大乱的年代相当, 所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图 2)。我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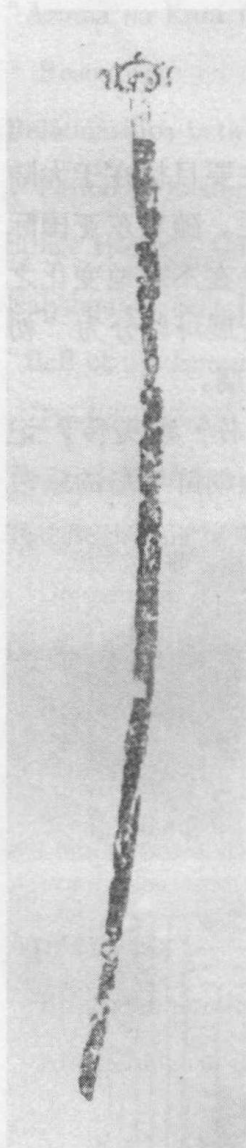


图2 “中平”
纪年铭铁刀

各地发现的其他有“中平”纪年铭的器物为依据，推测它是今四川省境内的广汉郡的产品（柄饰是以后在日本改配的）。由于“中平”以后中国黄河流域也发生大乱，倭国与以雒阳为都城的东汉的官方交往断绝，所以判断这柄铁刀是3世纪的汉末、三国时代从中国的江南传入日本的^[3]。

3世纪初期，历时数十年的倭国大乱结束，开始了以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为代表的新时期。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邪马台国的国力逐渐充实，对九州北部诸国的控制权也得到加强。卑弥呼女王谋求登上东亚的国际政治舞台，积极开展与中国亲善的外交活动，从而使日本的对中关系进入了我所说的“确立期”。

当时，中国分裂为魏、吴、蜀三国，故称三国时代。魏的领域在包括黄河流域的中原和北方地区，国势最强。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以司马懿为统帅的魏军讨灭了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克复了设在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两郡。于是，邪马台国于次年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派遣难升米等使者前往带方郡，进而到达魏的首都洛阳。邪马台国与魏亲善的目的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是，从《魏志·东夷传》所记种种事实看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借重作为东亚第一大国的中国的威望，巩固并提高卑弥呼在日本列岛的政治地位。

从魏的方面来说，公孙氏虽已讨灭，但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形势仍然严峻。在高句丽、韩、涉等土著民族的武装袭击下，乐浪郡和带方郡的安全受到威胁。与倭国交好，或许可以改善魏在半岛上的困难处境。因此，以难升米为首的邪马台国使团为魏所重视，在洛阳受到优厚的待遇。魏帝颁发诏书，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并以许多礼物相赠，其中包括铜镜百枚。翌年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由带方郡派遣官员梯儁随同归国的难升米等回访邪马台国，向卑弥呼送致诏书、金印和各种礼物，使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确立。

此后，邪马台国又于正始四年（公元243年）派伊声耆、掖邪狗等为使者，到洛阳朝贡。正始六年（公元245年），魏帝颁发诏书，赐首次访魏的难升米以黄幢，委托带方郡送致。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邪马台国与敌国狗奴国相争，卑弥呼遣使到带方郡告急。新任的郡太守王颀立刻派官员张政前往调停，并将两年前所赐黄幢交付邪马台国的实权人物难升米。卑弥呼死后，张政协助难升米等处理善后，立她的宗女台与为王。为了表示感谢，以台与为新女王的邪马台国派掖邪狗等20

人陪张政归国，到洛阳向魏进贡。在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短短8年内，邪马台国派使者经带方郡访问洛阳3次，专程访问带方郡1次，魏由带方郡派官员访问邪马台国2次。两国交往之频繁，关系之密切，这在东洋古代史上是极少类例的。

魏帝所赐“亲魏倭王”的金印至今没有被发现。但是，赐给卑弥呼的铜镜达百枚之多，可以估计其中的一部分已从日本各地的古坟中出土。从以河南省洛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国黄河流域出土的东汉和魏晋时期的铜镜种类来看，它们应该是“内行花纹镜”、“方格规矩镜”、“夔凤镜”、“兽首镜”、“双头龙凤纹镜”和“位至三公镜”等。在中国的三国时代，与江南的吴相比，魏的铸镜业不甚发达，所造铜镜多属东汉以来的旧式镜。其实，在魏帝赐给卑弥呼的礼物清单中，首先列举的是“绛地交龙锦”、“绛地纁粟罽”、“蒨绛”、“紺青”、“紺地句文锦”、“细斑华罽”、“白绢”等纺织品，然后是黄金和铁刀，最后才是铜镜、真珠和铅丹，正说明镜的数量虽不少，但质量未必很精美。要之，魏帝所赐礼物的重点不在于铜镜，而是在于各种珍贵的纺织品。可以说，邪马台国的使者除了完成政治上的使命以外，还为在中国的洛阳和日本的邪马台国之间开辟了一条“丝绸之路”。

学者们把日本出土的300余枚所谓“舶载的”三角缘神兽镜看成是魏帝所赐的“卑弥呼之镜”，这便是三角缘神兽镜的“魏镜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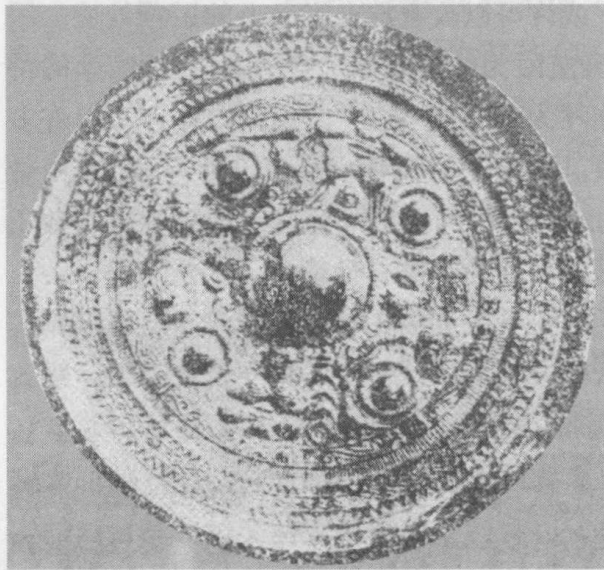


图3 三角缘神兽镜

3)。但是，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全境，始终没有发现哪怕是一枚三角缘神兽镜。同样，在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而起桥梁作用的朝鲜半岛也完全没有三角缘神兽镜出土。我从镜的形制、图纹和铭文等各方面考察，坚信只在日本才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不是来自中国的舶载品，而是东渡的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制作的^[4]。

个别三角缘神兽镜铭辞中的“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纪年，曾是“魏镜说”的有力的依据。但是，按照我的考证，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辞全文却说明它们正是渡来的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5]。景初三年邪马台国遣使向中国魏朝进贡，魏朝亦派官员于正始元年往邪马台国回访，这是非常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因此，作为纪念，寄身邪马台国的吴的工匠在其所作镜铭中使用了“景初三年”和“正始元年”的年号。我的这一判断，已被1986年10月京都府福知山市出土的景初四年盘龙镜的铭辞所证实（图4）。如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景初四年”是不存在的。只是由于在难升米等使者回到邪马台国之前，身在异域的吴的工匠不知魏已改称此年为正始元年，所以继在其所作三角缘神兽镜的铭辞中使用



图4 景初四年铭盘龙镜

“景初三年”的纪年之后，又在其所作盘龙镜的铭辞中使用“景初四年”的纪年，“景初四年”其实是正始元年^[6]。总之，景初三年镜、景初四年镜和正始元年镜在日本出土，既证实了《魏志·东夷传》所记倭与魏的官方的关系，也说明了倭与中国江南吴地之间存在着民间的交往^[7]。

3世纪日本与中国江南吴地的民间的交往，除了上述东渡的吴的工匠在邪马台国作镜之外，还包括倭人西渡到吴的会稽郡进行贸易。据《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吴志》记载，在会稽郡东方的远海中有亶洲，传说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至此洲不归，世代相传，到东汉后期和三国时代人口发展到数万户，其人民时有去会稽郡贸易的。我认为亶洲是日本列岛的一部分，所以推测奈良县东大寺山古坟出土的“中平”纪年铭大铁刀是东汉末年从江南的会稽郡传入日本的。进入三国时代以后，亶洲与会稽郡的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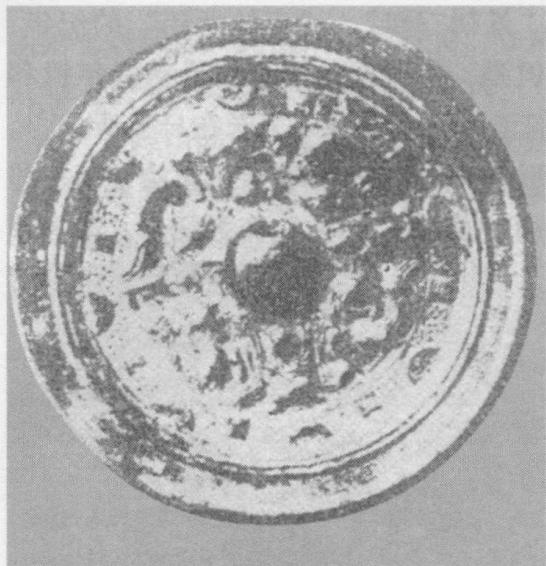


图5 赤乌元年铭神兽镜

地所作的铜镜便大量传入日本（图5）。日本各地古坟出土的铜镜，如山梨县鸟居原古坟的赤乌元年对置式神兽镜、兵库县安仓古坟的赤乌七年对置式神兽镜、冈山市庚申山古坟的对置式神兽镜、神户市梦野丸山古坟的重列式神兽镜、京都府椿井大塚山古坟的画文带对置式神兽镜、大阪府和泉黄金塚古坟的画文带环状乳神兽镜、姬路市奥山大塚古坟的佛像夔凤镜等，都是确实无疑的

吴镜。从三国时代中国南北分裂、魏吴敌对的政治形势来看，它们应该是从江南的吴地直接传入日本，而不是经由北方的魏境传入日本的^[8]。总之，大量吴镜存在于日本各地的古坟中，这正是亶洲人民西渡到吴的会稽郡进行贸易的结果。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晋武帝废黜魏帝而即位。可能仍然以台与（正始八年初立时为13岁，至此年应为31岁）为女王的邪马台国及时地于次年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企图维持自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以来的友好关系。但是，从此年以后，两国之间的官方的交往却长期断绝了。

然而，从考古学方面来看，日本与中国江南之间的民间交往仍继续存在。例如，按照我的考察，福井县泰远寺山古坟出土的铜镜和奈良县新山古坟出土的铜带饰都是中国江南的产品（图6），它们是西晋中后期至东晋前期，即3世纪末至4世纪中期从江南直接传入日本的^[9]。江南的吴国虽然被晋武帝的军队灭亡了，但日本列岛上的人民仍然有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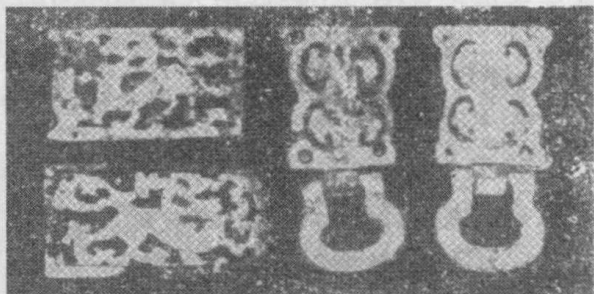


图6 新山古坟出土的铜带饰

海去吴的故地从事贸易的。可以说，3世纪至4世纪倭与中国江南的民间的交往，为5世纪倭五王与中国东晋、南朝进行官方的交往开辟了道路。

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中国北方战乱频起，终于酿成从公元307年开始的称为“永嘉之乱”的大乱。在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武力攻击下，洛阳和长安相继陷落。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晋元帝在江南即位，以改名建康的吴的故都为都城，史称东晋。此后，宋、齐、梁、陈四朝也继续以建康为首都，史称南朝。从4世纪初期至5世纪后期，中国北方始终处在混乱状态之中，而江南的建康则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所在。据《宋书·倭国传》等史书记载，在从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至宋顺帝昇明二年（公元478年）的65年间，讚、珍、济、兴、武等倭五王先后遣使到建康朝贡达10次之多，充分说明了倭与东晋、南朝亲善的高度积极性。因此，我称5世纪为日本对中关系的“急进期”。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经过4世纪以来百余年的经营，5世纪倭国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大为增长，在武器军备方面尤有显著的改进。大阪府河内平野的巨大古坟，显示了倭王在日本国内的强大统治权。这样，以倭王为首的统治集团便急切地谋求向海外扩张，首先是企图控制朝鲜半岛南部的的新罗和百济，进而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相抗衡。为了实现以上的计划，他们必须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这便是倭王们屡次遣使亲善的主要目的，在他们致宋的皇帝的表文中表露无遗（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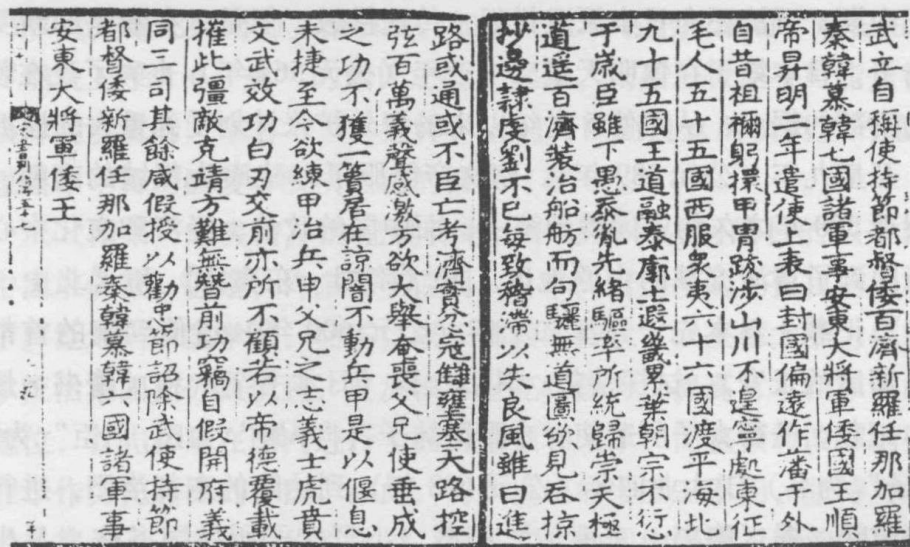


图7 倭王武致宋顺帝表文（《宋书·倭国传》）

从南朝方面来说,为了抵抗来自北朝的巨大军事压力,必须与包括倭国在内的海东诸国交好。但是,在海东诸国中,除不向中国朝贡的新罗不论以外,倭国在实力上不如高句丽强大,在与南朝的关系上又不如百济亲近。因此,宋的皇帝授高句丽王为征东大将军乃至车骑大将军,授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却仅授倭王为安东将军。只是到了最后,宋顺帝才晋升倭王武为安东大将军。由于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发现了重要的铭文,日本学者进一步考定倭王武即《日本书纪》中的雄略天皇。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表明,在雄略天皇统治期间,倭国的国力和倭王的权势得到空前的发展。这也许是他被宋的皇帝晋升为安东大将军的原因之一。据《南齐书》和《南史》记载,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和天监元年(公元502年),齐高帝和梁武帝先后改授倭王武为镇东大将军和征东大将军,两者在序列上比宋顺帝所授安东大将军又有所提高。这说明,朝代虽然改换了,但中国的对倭外交方针并没有变化。然而,从倭国方面来说,由于中国在对海东诸国的关系上始终采取审慎的平衡政策,不能给自己以充分的支持,所以感到失望。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是梁的开国之年,梁武帝进授倭王的官位,而倭王却不曾遣使相报,便说明了这一问题^[10]。

总之,进入6世纪以后,日本不再遣使与中国交往,却大大加强了与百济的友好关系。中国的许多典籍、文物,通过百济而传入日本。6世纪中期,百济还向日本派遣僧侣,传送佛教。但是,在新兴的新罗的攻击下,日本终于在钦明天皇二十三年(公元562年)丧失了设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据点,从而使5世纪以来的海外扩张计划受到重大的挫折。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征服了以建康为都城的南朝,使分裂近300年之久的中国得到统一,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重新回到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据《隋书·东夷传》和《北史·倭国传》记载,日本先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遣使到隋的首都大兴(即唐的长安),试探情势。其后,据《日本书纪》和《隋书·炀帝纪》记载,圣德太子所遣使者小野臣妹子(“小野”为氏,“臣”为姓,“妹子”为名)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到达隋的东都洛阳,进行正式的访问。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小野妹子所呈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完全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与中国打交道的。这与130年前倭王武在致宋顺帝的表文

中以臣下自居的谦卑态度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6世纪晚期以来高句丽、百济乃至新罗都分别接受隋的“辽东郡公”、“带方郡公”、“乐浪郡公”等封号的情况下，日本毅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这是意味深长的。

隋炀帝阅国书不悦，对主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是，也许是由于考虑到以后要对高句丽用兵，而倭与句丽素不睦，或可引为应援，所以特派文林郎裴世清随同归国的小野妹子回访日本，以求交好。从《日本书纪》的记载看来，日本方面对裴世清的接待，规模盛大，仪式隆重，既表明了对中国使者的热情欢迎，也显示了日本自身的国威。世清归去时，妹子又奉命随同到中国作第2次访问。这宛然是360年前难升米与梯儻、掖邪狗与张政的历史故事的再现。但是，从外交规格上说，裴世清的使命受自朝廷，与梯儻、张政之为郡太守所遣相比，其身份显然是高得多了。

上述见于史书记载的小野妹子和裴世清的事迹，至今仍被作为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佳话而广泛流传。但是，就考古调查发掘而言，却还没有发现直接与他们两人有关的实物资料。使人感到高兴的是，作为日本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墓志，船王後和小野毛人的墓志被作为“国宝”级文物而保存着^[11]。小野朝臣毛人是小野臣妹子之子（“朝臣”为天武天皇十三年制定的“八色之姓”之一，小野氏之姓由“臣”改为“朝臣”），这是毫无疑问的。据旧说，如果《日本书纪》中的“船史王平”为“船史王乎”（“史”为船氏之姓）之误，则船王後便有可能是在难波接待裴世清的“掌客”^[12]。这样，人们可以通过这两块贵重的墓志，联想当年中日两国使者联袂互访的情景（图8）。

从《隋书·东夷传》的记载看来，小野妹子访问的目的似乎在于向中国求佛教。但是，许多事实说明，日本向隋遣使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广泛地向中国学习，而不仅限于佛教的传承。以圣德太子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集团充分认识到，要从根本上充实国力，提高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地位，首先必须在国内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而整顿和改革的楷模则在于作为先进国的中国。因此，与5世纪的倭五王不同，坚持对等外交的圣德太子不向中国称臣求封，而是切实地向中国学习政治制度和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文化事业。他所创立的这种新的对中政策，被以后的日本统治者所继承。所以，在隋亡之后，日本仍然向唐派遣使者，而许